

为清华传统精神招魂——追怀黄延复先生

■吕文浩



2006年秋本文作者和黄延复先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前合影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忽然从朋友处听到黄延复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时颇感错愕。从1994年1月和先生相识,至今已经将近20年。早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时,我是先生家里的常客,不时地到先生家来聚谈,毕业后的若干年依然如此。只有最近几年,因个人的学业和家务拖累,去先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减少了。音问虽见稀少,挂念却一如往昔。我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兴趣,维持了很多年,在这个领域尽管著述不多,却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精力和心思。我的硕士论文将题目确定为《潘光旦教育思想述略》,最初的原动力即来源于和先生的第一次聚谈,这一点我在《潘光旦图传》的后记里有所提及。在我从青年到中年的生命历程中,黄先生给予了无数的实际帮助和精神鼓励,他对清华传统精神的坚定而恳切的陈述,更是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做人做事的气度。这样一个对我形成“清华情结”影响至关重要的师长,他的离世自然会引起我无尽的思念。

最近20年来先生不时地和病痛作伴,有时苦不堪言,甚至有一次是从病危中奇迹般的活了过来。然而先生的精神状态始终是昂扬的,在讲起清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事迹时他总是神采飞扬,一幅乐在其中的样子;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损清华传统精神的做法,他往往挺身而出,或执笔为文,或在讲坛上予以驳斥。这些年社会上对老清华教育理念和学术风格的兴趣持续不减,先生获得了很多阐述清华传统精神的言论空间,就连清华校方也一改过去极力否定老清华的种种做法,对于在校中利用传统资源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回想先生1989年退休前的10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先生愿意于老清华的教育理念和学术传统,尤其是梅贻琦的治校经验,受到了很大的压抑。2006年先生78岁时,徐晋如君帮先生设置了博客,令他非常兴奋,他终于找

到了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个人见解的平台,数年来乐此不疲,常常在上面贴些博文,或回忆清华生活,或介绍近期参加的活动,也时常发表对于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见解,网友们的回应也让他觉得受到重视,心情倍感愉悦。

我最后一次和黄先生通电话是前年徐晋如君委托我将《清华风流人物》的1500元稿费转交给黄先生之时,当时他极力推辞,不肯接受稿费。那次电话中听先生的声音还是清晰有力的,和以往一样充满了人情味。

再往前推,大约是2006年前秋天我去清华看望先生时的那次相聚。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和先生在他家附近的食堂吃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一起去图书馆听他给员工们讲清华图书馆的历史。期间,他还特意向听众介绍了我以及我新出版的《潘光旦图传》一书,因为潘光旦曾经当过6年清华图书馆的馆长。晚餐还是在食堂里一起用的,席间他大约谈了很多对潘光旦的认识,总的意思是觉得以前对潘的学识和志节认识得不够深入,有必要补补这一课,恰好图书馆给了他几百元的演讲费,他想把这笔钱花掉。回去后我便把这个意思转告了潘光旦先生的小女儿潘乃谷教授,潘老师便以打折的价格帮黄先生买了一套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也就是在那次相聚时,黄老师送给我清华三反运动时批判潘光旦的专辑,我也得以见到黄先生新写成的长文《清华四哲》(“清华四哲”是他清华校史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提法,他近年来曾在多个场合反复讲述)。那次聚谈,我忽然发现黄先生明显衰老了,精神状态也不如往昔。没有变化的,是他对清华传统精神的阐述,还是那么执着。我明白,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之所以能够在病痛和衰老的侵袭下保持生命状态的昂扬,端赖于此。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黄先生83岁时演讲的一个视频,先生只讲了

大约二十几分钟,便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一个年轻的合作伙伴去完成。视频中的先生语句很不连贯,时常停顿,尤其令人心酸的是不时出现吐字不清楚,致使字幕错字频出,连“通识教育”都被误写为“充实教育”。在演讲中,先生明确告诉观众,自己年龄这么大,还有病,为什么要出来不断地宣讲清华传统精神呢?那是因为清华校方尽管在这些年为发掘和弘扬清华的优良传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与黄先生所期望的“复原”和“创新”并举还有不小的距离,所以他还要拖着老病之躯,继续为清华传统的再生呼喊。从演讲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见解,但老者的坚持和执着却不能不令人动容。看了这个视频,我有点难过,没想到先生竟然会老病至此,和我以前所有的印象大相径庭。

现在很多地方介绍先生时都称他是“著名学者、教授”,其实先生对这些外在的浮名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不很顺利,甚至有长达20年作为右派备受排挤的岁月。在职称上他谢绝了退休

时可以争取给予的“研究员”名义,毅然以“副研究员”退休。对此,他也毫不在意,甚至写进了自撰“墓志铭”,所谓“流浪丁,副教授”是也。反倒是退休后,他不受束缚地利用在在职时搜集的资料写了大量的著述,这时也恰好赶上了社会上对老清华的热潮,由此他获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心情是愉悦的,这是先生一生难得的心情舒畅的时期。

在学术上,先生一生坎坷的遭遇使他追求自由的志向和愿望异常强烈,以至于不可收拾,他在在职时短短的十年研究时间把注意力集中于老清华的教育理念和学术风范,而不是那个年代多数同仁所热衷并刻意强调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很可以理解的。先生所整理编辑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梅贻琦日记》等书成为清华校史、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他阐释梅贻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多本著作不仅成为以后相关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谢泳先生十几年前所提出的目标:普及梅贻琦。许多清华校友可能不会忘记,先生所撰写的《清华园风物志》一版再版,前后不知道印了多少册,让许多读者由此了解清华校园内有形的传统遗留,并进而从物质的层次进入对清华传统精神的关注与追寻。先生对于清华传统精神的阐述,大部分篇章都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文集《清华传统精神》。他喜欢用“志述”一词,大约是欲表明其“述而不作”或“以述代作”之意。他意图展现“老清华人”眼中的“老清华”,而不是经过后人眼光过滤过的“老清华”,所以在行文中,他有时不惜大段大段地引述资料,将自己的见解隐藏在对原始资料的注解或解读之中。但是,从先生对资料的选取和解读以及所持的评判标准来看,他当然不仅仅是“述”,而是具有其鲜明的个性。比如,他首次提出了“清华四哲”(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的概念,并将个人志节的期许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又如世人皆将蒋南翔作为革命时代教育家的典型予以讴歌,并将蒋南翔和老

清华的传统以及梅贻琦完全对立起来,而在先生那里,蒋、梅之间存在着分歧和严重的对立是不足为怪的,但他们同出身于清华,同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所以同样有着清华人血脉里流淌的独立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当然,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说,我想先生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先生早年从老家山东黄县流浪至东北谋生,中学时代幸遇良师,打下坚实的文史基础,被国文老师赞誉“为文雄浑,有史迁之风”,可惜此后长期未能在所钟爱的科目下做专门研究。行政事务性工作以及长期右派带来的打杂工作,耽误先生的专业研习,直到将近50岁时才进入半研究半宣传性的校史研究室(后称校史研究室)。工作性质和这个平台给予他施展才华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更不用说先生家庭经济负担素来较重,他在研究之余还得花费不少时间精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以补贴家用。上世纪90年代时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是时间倒退20年,那个时候咱们相识,一定可以合作做很多事情。”这是对先生的抬爱,其实我想,先生真正的意思是说现在环境逐渐宽松了,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可是自己已经老了,退休了,精力也不允许自己有更大的作为。先生在清华校史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对一手资料极其熟悉,这使得他的许多研究是有扎实的根据的,也是有感而发的,但他的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清华本身,没能在更广阔背景下探讨清华个案的意蕴。先生固然有很好的文史基础,但严格的学术训练还是有欠缺的,所以他的作品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我想,先生是不会怪罪我在他身后妄加议论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有清醒的自知之明的。——他在自撰的墓志铭里有“学无精,识有透”就说明了一切,也是理解先生一生学术道路与人生追求的一把钥匙。

黄一农:用E考据“玩”红学

■本报记者 郭倩

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热闹非凡。在熙攘的研究潮流中,台湾学者黄一农院士的工作引人注意。三年前因缘际会涉足红学,在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二十多篇红学论文于《文史》、《曹雪芹研究》、《清华学报》(新竹)等一流刊物。黄一农的研究独辟蹊径,他多次言前人所未言,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观点。

黄一农20多年前留学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再后来转作天文学史、科学史,再后来转做纯历史研究,并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段传奇经历已为人熟知。转行和跨界在他似乎已是家常便饭,这次突然操弄起红学来固然出人意料,却也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本月中旬,黄一农来京讲学,从其研究成果“元妃省亲的历史原型揭秘”入手,并进而呈现和讨论他所采用的E考据的研究方法。日前记者专程采访黄一农院士,请他分享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诸多思考。

为了“好玩”进军红学界

黄一农院士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好玩”:神色和蔼,圆滚滚的额头下是一双常常眯起眼睛的眼睛,让人一见之下即生亲近之心。虽然已经是蜚声国际的学者,黄一农却有一颗顽童般的赤子之心。采访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我们的交谈被他一连串的爽朗大笑打断——他总能发现让自己、让别人快乐的东西。黄一农自己管这叫“自得其乐”。他说,做文科研究,大部分时候是很枯燥的,总觉得办法自己让自己快乐,乐在其中方能有所建树。

而黄一农转行“红学”,说起来也是为了“好玩”二字。他说,数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两头蛇》的,是最早关于E考据的一本代表作。在台湾给学生们上课,讲的东西回来回都差不多,是自己以往研究过的内容。课堂上每多讲一遍,索然无味之感就更多几分。于是他就跟学生说:“我们做一点好玩的东西”之前没研究过。“当时我正在研究火炮,看到期刊上一篇文章说,曹雪芹的祖先就是专门管红衣

大炮的教官。我想这好玩啊,跟我的研究也有关系。不妨‘玩玩看’。结果刚刚入手,就发现《期刊上》这些人鬼扯,曹雪芹的祖先哪里是管红衣大炮的——我比任何人都了解红衣大炮,事实上满洲人当时还没有红衣大炮呢。”

就这样,黄一农一脚跨入红学界,从此衣带渐宽终不悔,数年过去,愈得其中三昧。“我也不知道当初转行到底对不对。老实不客气地讲,在之前的研究领域里,我的位阶已经接近‘老大’;而做《红楼梦》呢,我是‘最小’。但我的性格如此,不会瞻前顾后,只要对一个东西有兴趣就可以完全投入进去,觉得好玩就会去玩。”黄一农说,“《红学》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去书店逛逛就会发现,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太多了,作家的身份也是稀奇古怪,有物理学家、数学家,有工程师有农民有工人。我发现许多写书的人往往从未发表过论文。从来没有一个领域像红学这样,学术界跟非学术界的人共同关注同一个研究对象。红学让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一个蓬勃有趣且间接的状况: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奇特互动。”

“大家没办法用同样的语言对话,彼此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百分之百的发言权。非学术界的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指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时候,学术界的人没有能力或意愿‘回嘴’。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像红学界这样集体发言,由此可见红学是多么深入人心。”

让红学与清史对话

对于人们把他归为索隐派,黄一农很是不以为然。他辩驳道,“撇开《红楼梦》不谈,我讲的东西就是真实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研究的是真实的历史。”而索隐派的一贯做法是将理论建立在别人没办法证明的前提下。

“我并不是纯粹研究《红楼梦》。我的研究是为了让红学与清史‘对话’。《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的背景下,它可以让现代的读者体会18世纪人的生活、思维方式。中国有数不清的章回小说,为什么《红楼梦》独放异彩,为什么

当时、现在都有这么多人喜欢读呢?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本像这样描写旗人生活方式的小说。书中的旗人又并非纯粹的满人,而是汉姓包衣。他们有着汉人的血统,但是作为满人的奴才夹在两个文化的传统之间。所以这部小说的很多语言、风俗就是满汉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我不会细致地研究《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我选择元春、选择‘元妃省亲的历史原型’这个题目,是因为这部分可以跟清史对话,所以我把它挑出来了。”

黄一农在讲座中提到,《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一节(书中第16至18回),其历史原型乃与发生在顺懿密太妃王氏身上的两件世所罕见之异事有关:一是她年轻时曾随南巡之康熙帝在苏州寻得失联父母,二是她年老时曾获乾隆帝特恩允许出宫归省儿孙。黄一农研究发现金陵织造隋赫德与曹寅的妹夫傅鼐是语音察氏同祖之叔侄,由此推出先后出任江宁织造的曹■、曹■兄弟与隋赫德三人谊属同辈远亲。而且由于明珠之孙永寿的诸女当中有四人分嫁福秀(平郡王纳尔苏之子,曹寅外孙)、傅恒、弘庆和弘胤,曹家因此与爱新觉罗皇族以及叶赫纳拉、沙济富察两大世家建立了间接的姻亲关系。

黄一农说,我们思考一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一节里详细描述的车马、仪仗、服饰等细节,即使是再好的小说家也难以完全虚构出来。曹雪芹只能通过身边的际关系听说得来或是自己亲身经历。康熙朝密妃嫁入宫中,二十年不得与家人联系,随康熙南巡时寻找到自己的父母,以及晚年获准出宫归省儿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曹雪芹极有可能通过表哥福秀的亲戚口耳相传了解到详细情节,从“太妃归省”脱胎出“元妃省亲”的细枝末节。

提出问题,再从问题中走出

很多研究红学的人都很关心曹雪芹是哪里人,祖籍在什么地方。有说法认为曹雪芹祖籍唐山丰润。可黄一农认为,曹家不停地迁徙,祖籍是无法追查的。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忘记一件事:很多时候

一个人究竟是哪里人在于他自己的认知。有时候出生地、常住地和身份证确认地都不一样。当别人问我们,你是哪里人时,我们的回答才是真正对自己的认知。曹雪芹认为自己是哪里人,他就是哪里人。但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则无法考证。尤其是战乱时期,每个人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里人。曹雪芹祖籍是不是丰满并不重要。如果他的祖先生活环境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那才是重要的。如果搞学术研究一直追溯到曹氏二十代的祖先,追到宋朝,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重点要研究清楚曹雪芹的曾祖、高祖这几代,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包衣,对其后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那么,红学研究繁复琐碎,做这么刨根究底的考证究竟有何意义呢?

黄一农解释道,有时候我们不能问文科研究有何价值、有何意义。就像艺术真正的价值在于对美的追求,艺术家把自己的感受用人的情感世界做最大的体会、尝试。你问我研究《红楼梦》干嘛,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小说,千千万万的人尝试从小说里面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有这么多人关心它,却理不清它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黄一农认为自己应该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如果做得好,那么大家对这部“神奇作”的理解就会提升一个层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因为这本书而吵架。“《红楼梦》这本小说这么精彩,可不是让大家为它吵架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体会,这本小说是为什么而写:是为了‘替女性发最大的声音’。我不是要告诉你元妃是谁、大观园的原龙去脉,那真的不是我的结论重点。但是如果这个研究元妃、研究大观园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全体会、完全了解曹雪芹写小说的初心,也就不能得出上面这个结论。”黄一农说。

要研究一个问题,提出它之后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要最终能够从问题中“走出来”。黄一农这样认为。他说,自己的每一个研究,往



黄一农在做讲座

往最后得到的答案已经超出了最初的提问。

复原历史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

黄一农的著作《两头蛇》取名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明朝末年著名的士大夫孙元化,既是儒家的学者,又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没有子嗣,儒家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应娶妾生子;可天主教却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矛盾中他偷偷娶妾,不为外人所知。明朝灭亡,孙元化作为将领应自杀殉国,可天主教禁止自杀,孙元化说,我的一生都处于儒家和天主教的矛盾中,就像两个头的蛇一样。《两头蛇》中研究了很多像孙元化一样17世纪奉教人士的心态历程。黄一农说,自己是通过E考据找出大量的人际关系,从这些人际关系进而了解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研究《红楼梦》也是如此。黄一农揪出纳兰家的整个脉络,发现里面最可能跟曹雪芹搭上关系的就是弘庆,因为他的祖母就是密妃。“就是通过人际关系网才掌握了纳兰家跟曹家、跟傅恒家是什么关系。有时候研究就是很巧的事,我是因为追着这个故事,发现一点端倪,根据自己的敏感度继续追下去,很幸运找到了答案。当然也不见得每次都能找到答案的。”黄一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不会从零开始,他会从密妃身上看到很多精彩的、戏剧性的故事。作为一个一流的作家,曹雪芹很敏锐地利用这些第一手的材料,把它们放到书里。”

E考据,时代对学者的新要求

传统的学者做研究的局限之处在于往往于考据困难。研究成就的高

低受限于个人记忆和查找纸质资料的能力。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购买学术资料,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信息库。E学术资料库一旦建成,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关键词寻找需要的资料,在很短的时间内检索大量信息。如此就显著减少了人力阅读检索的工作量,“E考据”由此诞生。E考据给当代的学者提供了海量的资料,同时也对现代人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一农说,任何时代的学者都应该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考据是一个基础功,是过程。研究一样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其中的人事物的关联性。E考据就是在E时代做考据,传统的基础积累不能丢,现代的方法也要掌握。“如果这么多工具和条件提供给我们,研究结果的水平却跟上一代人差不多,那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到丢脸呢。我们应该问不同的问题,并尝试把它们推到不同的高度。”

黄一农认为西方科学的训练对自己做E考据最大的助益在于培养了他逻辑推理的能力。历史研究的大多数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可能标准答案。“记忆性的东西不需要会,要用的时候再来学习。我出国博士考时绝对对不考记忆性的内容。我最喜欢出的题目很简单,从一本古书里面摘一段出来,首先请标点,接下来请告诉我这段文字你能问出什么问题,你有可能从哪些文献切入进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提问的意识和能力。

“E考据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它绝对会使文科研究产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跟我同年龄的不少学者会对当下的研究形态不适应,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在自己已经浸淫三十多年的领域里被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指摘。他们不能体会和适应E考据带来的巨大变化。传统和现代的功夫都要做足,才能超越前人,达到新的高度。”黄一农说。